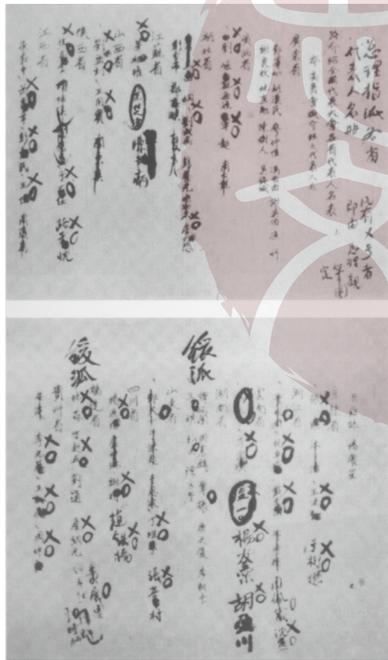


首次國共合作

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以「改組」為中心內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珠江南岸國立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六年七月改名中山大學）禮堂裡隆重正式開幕了。這是孫中山在四十年奮鬥中最能展示其革命抱負的一次大會。

大會的海內外男女代表總數一百九十六人，實際出席一百六十五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六人也列席了會議。每省的代表中有三人是孫中山指定的，有三人是由各省推選的。海外代表多數由各支部推選。指派陳璧君、何香凝、唐允恭為婦女



孫中山審定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代表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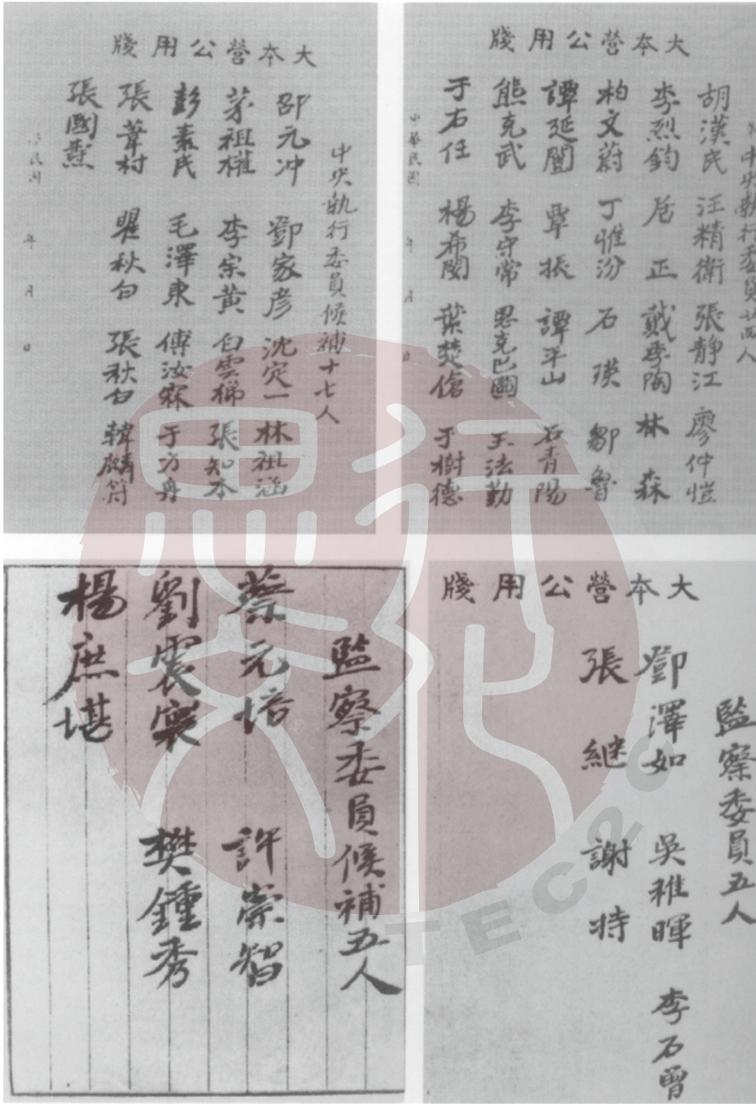
代表。

大會主席是總理孫中山。在由各省推選和由孫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二十六名中國共產黨人，出席這次大會的有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林祖涵（伯渠）、張國燾、李立三、於樹德、夏曦和羅邁（李維漢）等二十四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另四人是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和章程、宣言、宣傳三個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大會的幾個審查委員會中，也都有共產黨員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

代表大會開幕後，孫中山首先致開幕詞，他指出：「從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復起來，改組國民黨。」宣稱「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同時，還揭示了一條教訓，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由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要求大家加以提防、警戒，此後再「不可以無意識的問題來挑撥意見……生出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主持了會議，並提名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圖為大會會址——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禮堂。



孫中山手書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

無謂的爭論」。⁴⁴當天下午，孫中山又作了《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的報告，強調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國民黨改組問題」。認為「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將十三年種種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以前有種種力量來創設民國，以後便有種種力量改造政府」。⁴⁵

孫中山為大會的順利進行傾注了全部心力，他在大會期間作過《關於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歡宴國民黨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關於民生主義問題之說明》等八次重要講演。在講演中，總結了一九一一年後的歷史經驗，再次提到因為沒有正確的革命方法，革命也就沒有成功。他所說的革命方法，就是革命政策，即「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⁴⁶孫中山又指出，國民黨的組織散漫，黨內分子不純，「反對革命之人，均變成贊成革命之人」。因此，他提出改組國民黨的組織原則是：淘汰不純分子，吸收革命分子。

孫中山把混進國民黨內的軍閥、官僚和腐敗分子，斥責為黨內「最卑鄙」的人，主張必須加以淘汰，清除出去。他曾不止一次對宋慶齡說：「國民黨裡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把黨當成升官的踏腳石而

44 劉芷芬編：《孫總理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本。

45 劉芷芬編：《孫總理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大會秘書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印本。

46 在孫中山的著述和國民黨「一大」文件中，沒有「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一概念和提法。但是，由於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個方面的內容都是來源於孫中山，所以，它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從特定的角度對孫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張的較為精煉的概括。

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

同時，孫中山又堅決主張吸收新的分子，接收共產黨人和工農分子加入。並決定首先在廣州舉行黨員登記，分頭調查廣州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狀況。還決定統一宣傳機關，限制黨員對外發表關於黨務的意見；設立講習所，用以訓練基層幹部。

在《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中，孫中山對一些人對聯俄、容共持有不同意見，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俄國既為各國所承認，故就利害而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到中俄互助之益。」；「此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孫中山還按照自己的理解，闡述了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他說：「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體主義』，均包括其中。」；「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不過為解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本黨同志於此便可十分瞭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耳」。⁴⁷毫無疑義，這是孫中山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誤解，但這在當時對於說服人們接受他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等重大政策卻起了積極作用。

在代表大會上，譚平山代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報告，柏文蔚作了軍事報告，各地代表作了黨務狀況報告。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國民黨章程》、《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出版及宣傳問題案》等重要的議案，還通過了改組國民黨使之

革命化的各種具體辦法。

大會議程，除安排中央和地方關於黨務的重要報告外，還要通過下列五項重要決議：

一、中國國民黨章程；

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三、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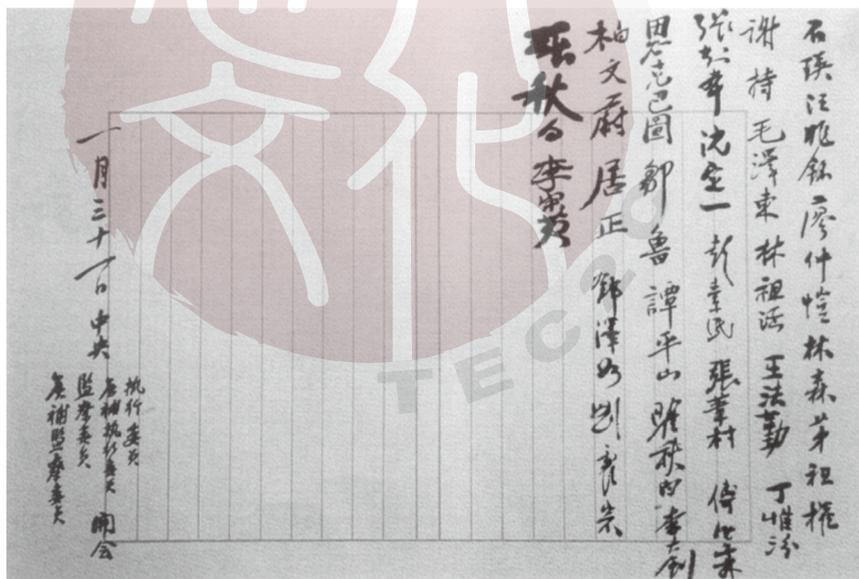
四、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候補委員；

五、選舉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候補委員。

大會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委員名單是由多數同志推舉、孫中山審定後提交大會通過的。選出二十四名中央執行委員，他們是：胡漢民、汪精衛、張靜江、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闓、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守常（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法勤、于右任、楊希閔、葉楚傖、於樹德。選出十七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他們是：邵元沖、鄧家彥、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彭素民、毛澤東、傅汝霖、于方舟、張葦村、瞿秋白、張秋白、韓麟符、張國燾。中共黨人李守常（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瞿秋白、林伯渠、于樹德、沈定一、于方舟、韓麟符和張國燾十人，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監察委員五人，他們是：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監察委員五人，他們是：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鐘秀、楊庶堪。大會在保留「總理」的名義下，將選出的領導機構採取委員制。大會於三十

日閉幕，孫中山致閉幕詞。他指出：這次大會「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的主要成果，孫中山認為是革命有了「辦法」。孫中山所說的革命「辦法」，就是革命政策，即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等。所以，孫中山在大會閉幕時滿懷信心地說：「我們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辦法，所以成功與失敗各有一半；從今以後拿了好辦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無前，有勝無敗，天天成功。」他要求大家散會以後「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奮鬥」。⁴⁸

大會進行期間，傳來列寧逝世的噩耗。在孫中山的提議下，大會致電莫斯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決定會後黨務工作。圖為到會者簽到名單。

科，表示深切哀悼，並決定休會三天以示悼念，同時宣傳列寧的生平及事業。不久，孫中山又出席了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的追悼列寧大會，親筆書寫了「國友人師」祭帳，並致悼詞，再次表示深切哀悼。

這次大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這次大會上，三民主義有了新的發展，制定出一個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綱領，並在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左派的共同努力下，經過與國民黨右派分子的辯論和鬥爭，確定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等重大革命政策，承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改組中國國民黨為工人、農民、

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盟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這次大會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它的勝利召開，國共首次合作的實現，以及大會宣言的發表，是孫中山革命生涯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標誌著他的革命思想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國民黨在廣州第一公園舉行追悼列寧大會。圖為孫中山在主席臺上主祭及宣讀悼詞。

然而，圍繞著這個重大轉折展開的鬥爭也是非常激烈的。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就是發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的同一天，國民黨右翼勢力的代表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向孫中山聯名提出反對「容共」政策的書面報告，妄圖破壞國共合作。孫中山的立場是堅定的，據林伯渠的記述，孫中山當即「斥責堅決反共的頑固分子說：『你們不同共產黨合作，我就解散國民黨，加入共產黨。』他向那些頑固分子說：『你們仍舊反對同共產黨合作嗎？』頑固分子回答說，他們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孫中山就毫不遲疑地對他們說：『那麼好，開除你們的黨籍！』」⁴⁹孫中山的態度是十分堅定的。在這次大會期間，在一月二十二日通過《中國國民黨章程》時，仍有少數人反對國共合作，製造障礙，以致推遲了章程的討論表決。一月二十八日，又有人提出應明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案，⁵⁰其用意是反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對此，李大釗發表《意見書》說：「兄弟深不願在本黨改造的新運動中，潛植下猜疑與不安的種子」，「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巧取討便宜」。「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⁵¹對此若「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礙，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⁵¹國民黨左派人士廖仲愷等紛紛發

49 林伯渠：《在北京紀念孫中山誕生九十周年大會中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50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檔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五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1 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九輯，臺北一九五八年版，總第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六頁。

表聲明，支持李大釗的發言，認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本黨一個新生命」，是國民革命所必須的。大會否決了國民黨員不得跨黨的提案，通過了新黨章。

這次大會以後，各省、市的國民黨大部分也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進行了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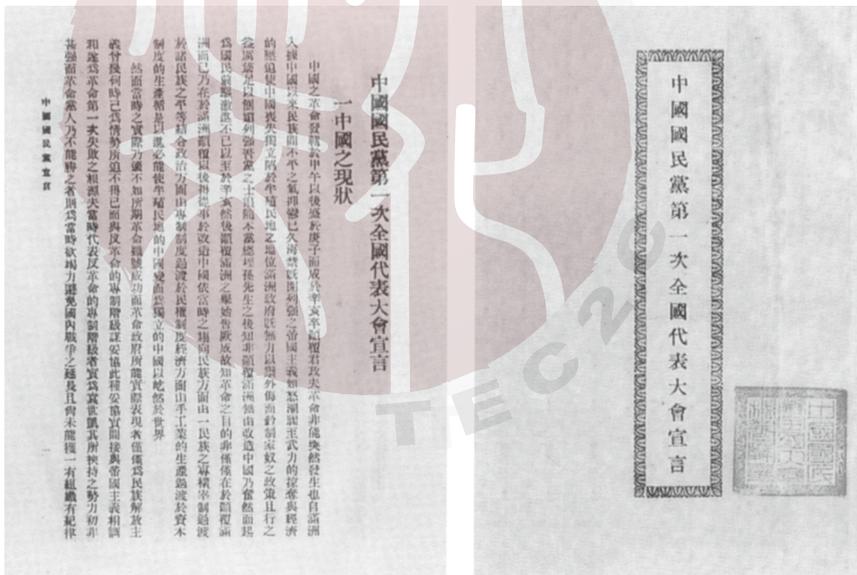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第二天，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推定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常務委員，組成秘書處，負責處理中央的日常事務，並決定了中央黨部的組織機構。二月四日推定了以下各部部长：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長戴季陶，青年部長鄒魯，工人工長廖仲愷，農工部長林祖涵（伯渠），軍事部長許崇智。隨後，中央黨部會議再推定婦女部長曾醒、海外部長林森。後來增設商民部，部長為伍朝樞；增設軍事委員會，蔣介石等為委員。會議考慮到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等地遠離廣州中央，當地的政治環境比較複雜，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前往組成執行部，指揮、監督這些省、市黨務的開展。隨後分別成立了北京、上海、漢口三個特別區的執行部。

國民黨「一大」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制定了一個反帝反軍閥的三民主義綱領，並在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積極努力下，通過與國民黨右派勢力的辯論和鬥爭，確定了推進革命的政策，確認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從而完成了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從此，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得到確立。

會後，各省、市的國民黨大部分也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進行了改組。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一月三十日⁵²通過的著名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在孫中山親自主持下，由國民黨員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及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瞿秋白參與起草。因此，可以這樣說：這一宣言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代表共同制定的。宣言草案經專門委員會審查修改後，於二十三日大會表決通過。二十四日又由孫中山委託汪精衛提出增加宣言中「對內政策」第五條的動議，經大會表決通過。三十日又由孫中山授意廖仲愷提出增訂「對外政策」內容的動議，經大會表決同意，委託孫中山授

52 此據代表大會對宣言最後一次表決日期而定。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檔。它反映了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新發展，成為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的綱領。圖為檔封面及大會宣言（局部）。

正有關文字條款。

大會宣言總結了

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特別是辛亥革命的教訓），分析和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錯誤的、反動的政治流派——立憲

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及商人政府派，認為那不過是「空談」或「惡意的譏評」。指出只有實行國民革命和三民主義，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確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作為奮鬥的目標。還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條約，廢除軍閥所借的外債和確定人民的自由權利，改善人民生活等為主要內容的內政外交政策，作為國民黨的政綱。並決定歡迎農民工人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

這樣，改組以後和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黨，就改變了原來的面貌，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基本上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就成為這個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在這次大會上，三民主義有了新的發展，制定出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並在共產



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是孫中山建國治國思想的重要體現。

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經過與國民黨右派分子的辯論和鬥爭，確定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等重大革命政策，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改組中國國民黨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盟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這次大會標誌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它的勝利召開，國共首次合作的實現，以及大會宣言的發表，是孫中山革命生涯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標誌著他的革命思想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高峰。

從此，中國革命迅速出現新的高潮，興起了中國近代民主革命歷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這樣，才使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發展三民主義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期間，孫中山在廣州文明路國立高等師範學校親自開關了一個系統講述三民主義的講座。據他在《民族主義》自序中說，「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一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
五 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二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

二十五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投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民國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寫於廣州大
本營為
賢妻慶齡玩索 孫文

孫中山書贈宋慶齡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局部)。

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才專門安排這個系列講座的。演講在學校禮堂，黨、政、軍人員和學校教職員學生等都來參加，鮑羅廷和蘇聯顧問也來參加。每次演講，黃昌穀做筆錄，鄒魯讀校。

孫中山原定民族、民權、民生每個主義六講，共十八講，但從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一共只作十六講，八月二十四日以後，因對付廣州商團叛亂及準備北伐而中輟，民生主義部分未講完。從河南省士敏土廠大元帥府到廣東高師，往返路程有五華里。開始時，孫中山是乘三部汽車，後來孫中山問過庶務，知道每次往返車費需十五元。他嫌花費太多，以後每次都是率領著副官衛士步行前往。



孫中山批改的「三民主義」演講記錄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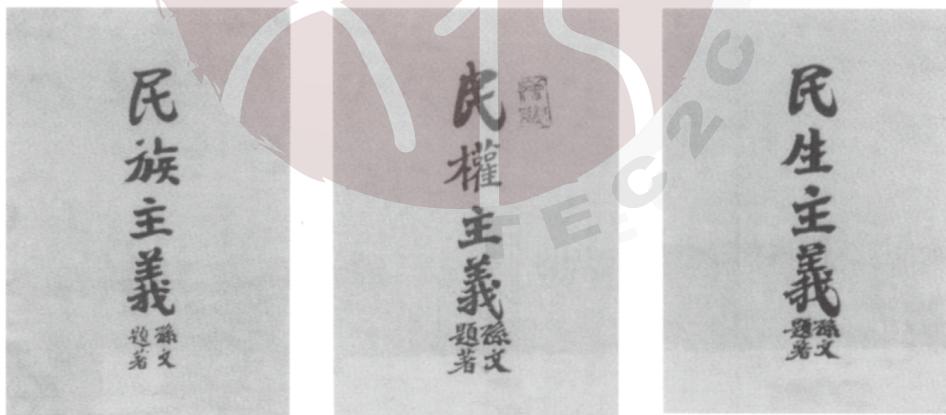
孫中山的演講筆記稿經他本人多次校改，並且，每講完一個主義後，再經他本人修改審定記錄稿，初於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中國國民黨週刊》逐講發表，繼由國民黨中央於同年分三冊陸續編輯印行，年底又出版了合訂本，作為對黨員和民眾「宣傳之課本」。很顯然，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宣言通過後即作系統的三民主義講演，他的目的是要國民黨員正確理解他的學說和思想，按照他的思想路線去從事實踐，當然也包含有澄清社會上一些人對他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建立國共首次合作的誤解有關係。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十九世紀末年走向革命後逐步形成的革命思想，是孫中山最重要的革命學說和政治綱領。自從一九〇五年十月在《〈民報〉發刊詞》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後，便正式開始了三民主義思想發展史。在漫長的鬥爭歲月裡，孫中山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及其本人認識的提高，曾經多次對它的內涵作過闡釋。這次演講詞，是孫中山歷來闡述三民主義中最系統、最詳盡和篇幅最大的一種。孫中山感到以前所講的三民主義，不夠明確，也不夠徹底。在這次演講中——特別在同一時期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孫中山根據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對拯救中國和改造中國社會提出了新的認識，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有了發展，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內容，使它在新的歷史時期獲得新的革命內容。使它對當時的中國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它成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綱領。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的勝利。

國民黨「一大」宣言重新加以解釋的三民主義，克服了原三民主義的根本弱點，以與前不同的嶄新面貌出現。

發展後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國民黨「一大」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就是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下解放出來，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爭得獨立自由。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也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實現。

原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並非不包含反帝的內容。「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反復強調，只有推翻賣國的清朝政府，才能避免列強瓜分的厄運。但是，舊的民族主義只有反清口號，沒有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八月，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對三民主義的內容與涵義進行系統地闡述，演講的筆記稿經孫中山修改後出版發行。

反帝口號，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革命派以為推翻清朝，中國自強起來，帝國主義也就會刮目相待了，這自然是個幻想，殊不知帝國主義決不允許一個獨立而強大的中國存在。這種幻想使他們的鬥爭屢次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絞殺。新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則擺脫了這種幻想。它指明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最主要的敵人，「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因此確定「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在一九二四年的《北伐宣言》中，孫中山還強調說：「此戰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孫中山寓所舉行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三周年紀念會合影。前排左起：鄧中夏、喻育之、孫鐵人、茅祖權、張繼、胡漢民、汪精衛、謝持；前排左十：向警予。

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⁵³他把反帝看做革命的首要目的。正因為具備了這種認識，新的民族主義舉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

發展後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是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民權主義。國民黨「一大」宣言規定了這樣的原則：「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這裡說的「為資產階級所專有」的民權制度，指的是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即資產階級專政，它是在資產階級世界革命中興起的，舊民主主義追求的「國民的國家」，實質上就是這種模式的國家。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專政，資產階級如果要拋棄其革命盟友，只能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聯合，造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也就是說使革命前功盡棄。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興起後，更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孫中山看到這一點，因而強調：我們「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他主張建立一個「最新式的共和國」。按照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原則建立的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在這種專政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新的民權主義作為建

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型共和國的理論雖然還不完備，卻無疑是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有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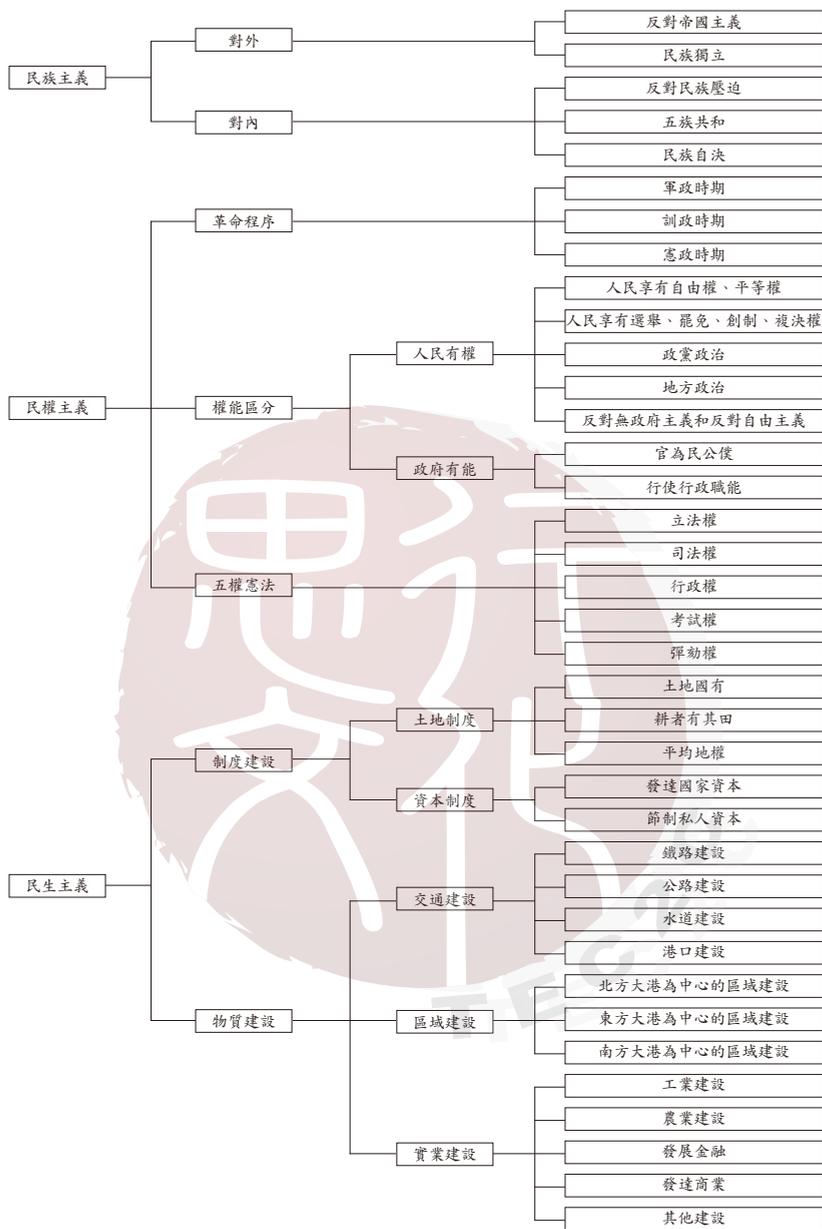
發展後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是反對地主資本家「操縱國民生計」的民生主義。國民黨「一大」宣言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針對地主「操縱國民生計」，「節制資本」針對資本家「操縱國民生計」。

「平均地權」是在原來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提出的口號。前後三民主義都認為「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這一認識如果指的封建、半封建社會則是正確的，如果指的資本主義社會則不符事實，因為那裡「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均者」是少數資本家佔有大部分生產資料，而工人階級則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不僅土地。舊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所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利息與地租的分割。孫中山有鑒於歐美「社會革命其將不遠」，企圖補以「平均地權」，通過將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者獨佔的地租收歸國有的辦法，調節資本與土地私有權的矛盾。他自以為這樣做，可以「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這純然是主觀社會主義的幻想。舊「平均地權」提倡的核定地價、增價歸公，針對著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地主土地所有權，因而消滅不了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說，舊三民主義沒有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綱領。新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提出了新的方針，即「宣言」所說「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這一方針，孫中山後來又將其歸納為「耕者有其田」。他指出，「農民問題真是要完全解決，

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⁵⁴確定了「耕者有其田」的方針，三民主義才有了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的綱領。

「節制資本」的「要旨」是：「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節制資本」並不反對「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要用「國家資本」來掌握「國民生計」的發展方向。「國家資本」性質當然取決於國家政權的性質和社會基本生產關係的性質，如果將三民主義作統一的理解，國家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執政黨是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黨，其「國家資本」當然具有進步的性質，它將能夠防止私有資本制度操縱國民之生計，也就是說將使革命的前景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從上述三民主義的基本內容來看，我們不能不認為它是三民主義的重大發展，是孫中山思想的重大發展。這種發展，概括起來，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由於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使新三民主義有了比較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第二，由於提出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和「節制資本」的內容，發展了的三



《三民主義》主要內容示意圖。

民主主義對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對原來三民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理想，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正因為有這兩方面的發展，使前後期的三民主義有了根本區別。

總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有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漸完善，並不斷發展的深化過程，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前後期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就其涵蓋的內容來看，後期的三民主義具有明確的反帝內容和對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人民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明確的解說。所以，孫中山前後期的三民主義的內容是不完全一樣，是有前後期之別的。也就是說，二者都統稱「三民主義」，具有延續性。然而，它們又有著明顯的質的區別。原三民主義，從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範疇，而發展了的三民主義，則從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範疇，這就是二者本質區別之所在。

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從一八四〇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勝利，一百一十年中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革命，它是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分，但其目標不是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將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為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必要的準備。新民主主義革命乃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正適應著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兩個不同時期的歷史需要。孫中山把三民主義發展了，使他的思想實現了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飛躍。

發展了的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來說，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綱領，這首先表現於它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三民主義，它是要求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三民主義，它是主張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而避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三民主義。但美好的理想、明確的目標，還不足以決定事物的全部本質。理想的實現，目標的堅持，有賴於正確的政策、發展了的三民主義之所以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就是因為它有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其成功的基本保證。

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是在確定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三大革命政策是三民主義不可分割的部分，決定著三民主義的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決定著三民主義究竟能否真正實行。如果不把三民主義的新解釋同三大革命政策聯繫起來作統一理解，就不可能認識到發展了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因此，三民主義的新與舊之爭，真與假之爭，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向來都集中於對三大革命政策的態度上。一切仍然想打「三民主義」招牌的三民主義的叛徒，都千方百計地割裂三大革命政策和三民主義的本質聯繫。後來成為民族敗類的汪精衛在其背叛革命時就製造了一個理論，說什麼三大政策是「為應付時代與環境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有同樣長久的時間性」。這完全是掩飾其叛徒面目的詭辯。一切願為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鬥的革命者，都堅持三大革命政策與三民主義的本質聯繫。

三大政策在三民主義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是偶然的。

發展了的三民主義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它必然為帝國主義所不容，而只能得到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只有蘇聯一個）、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援。對此，孫中山最後有了清醒的認識。他指出：「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吾黨。」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受屈之人民」，方才是中國革命真正可靠的朋友。為此，他確定了聯俄的政策，要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要求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同蘇聯密切合作，要求中蘇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聯俄政策的確定與堅持，表明了孫中山是如何努力使中國革命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及世界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聯合起來。這正是新三民主義得以實現的一個基本的國際條件。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裡，決定性的因素是無產階級的領導。近代歷史已經證明，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不能取得勝利。自從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後，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使命便落在了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便在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從中國實際出發，自覺地投入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並承擔起領導責任。孫中山宣導並堅持容共政策，將實現新三民主義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這一「新鮮血液」，儘管他本人思想上並沒有意識到，他的實踐正適應了由中國共產黨承擔起領導民主革命職責這一歷史性的轉折。我

們不能忘記這一歷史事實：《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一國民黨發展史上劃時代的文獻，便是由中國共產黨著名理論家瞿秋白同國民黨「左派」代表廖仲愷及國民黨顧問鮑羅廷等人，參照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供的一個俄文草稿共同擬定的。共產黨人的說明和孫中山自身認識的飛躍，二者的結合和統一，產生了後期的三民主義。沒有國內國際無產階級的直接的具體的幫助，就沒有新三民主義。當時，國民黨內的右派以此為口實，企圖推翻這個宣言，孫中山立即批駁了他們，確認這一宣言「我加審定」，告誡他們「切不可疑神疑鬼」。他並在演說中明確指出：「此宣言將國民黨之精神、主義、政綱完全發表，並應使之實現。」這是孫中山在實踐中接受中國共產黨幫助與適應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的突出表現。事實表明，孫中山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正是依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才完成了國民黨「一大」的歷史任務，實現了國民黨的改組，方才使得國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獲得新生，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

「容共」在三大政策中是一個關鍵。三大政策是統一不可分的。沒有「容共」、「聯俄」便將失去其與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相聯合的本質。沒有「容共」，便不可能做到「扶助農工」。只有「容共」，反帝反封建才能堅決徹底。只有「容共」，才能使「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的民權主義，由一般平民享有民主權利的問題，上升為「國體」問題，上升為國家政權的階級結構問題，從而使三民主義同決定中國民主革命前途的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因此，沒有「容共」政策，三民主義

的性質就會改變，其實現也只能徒托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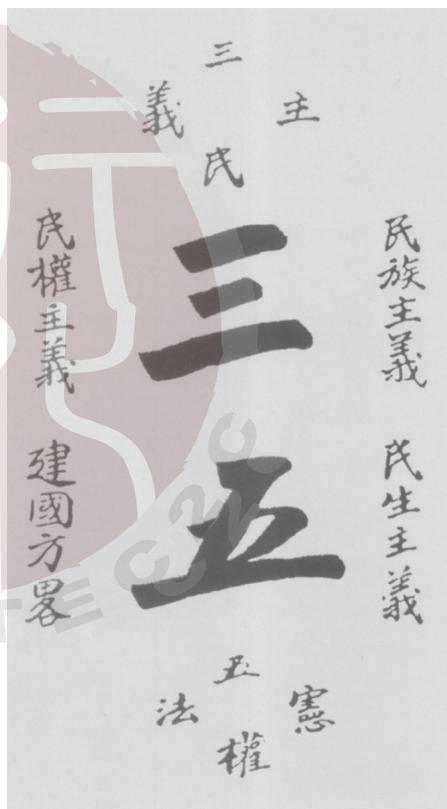
國民黨「一大」宣言在解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時寫道：反對帝國主義、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這裡所說的實際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民族解放鬥爭的本質上也是階級鬥爭，這裡將這四個階級看做反帝鬥爭的主要階級基礎，顯示了這一鬥爭的新的社會內涵。「宣言」在說明民權主義時，特別強調了國家權力「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在說明民生主義時，特別強調了「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並宣佈「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目的都是一個，即動員最廣大的工農群眾起來為完成中國革命而奮鬥，並使這一革



一九二四年一一八月，孫中山在廣州系統地講述了「三民主義」，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充實以時代精神，使之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圖為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校演講三民主義時的情景。

命真正能給廣大工農帶來解放，使這一革命的內容和前途不為民族資產階級一個階級所決定。「宣言」的這些規定，以及孫中山重視工農力量，給工農運動以積極支持的實際行動，使新三民主義的實現獲得了廣大的群眾基礎和強大的動力，而這又正是新三民主義之所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又一個重要標誌。

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他的實際行動，以及三民主義實踐的歷史，都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⁵⁵。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手書。

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相比，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這就是它所完成的雖然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任務，但它同時又在給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並以社會主義革命為其必然趨勢。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在這一點上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有著顯著不同，它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綱領，就民主革命綱領而言，也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那麼徹底。這是孫中山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民主派，由歷史所造成的局限，我們不能苛求。然而，儘管如此，新三民主義由於它是三大革命政策的三民主義，由於它因三大政策而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聯繫在一起，因而它的實現，在客觀實踐中，也不可避免地會為中國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提供極大的可能性。這是已經獲得證明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真理。

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的豐功偉績，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經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共同作出的決定。

革命的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因其政治原則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基本相同，被正在領導人民大眾進行民主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宣佈為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並以自己的實踐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廖仲愷、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忠實於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國民黨左派人士，為了實現發展了的三民主義，同中國共產黨人並肩進行了戰鬥。國共兩黨共同努力，發動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使新三民主義逐步被推廣到民眾之中，在全國很大一部分地區得以實行。

發展了的三民主義的目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它從一產生起，就被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仇視。他們在國民黨內外的代表人物從一開始就或者公開地、或者隱蔽地反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一九二七年，正當在革命行將勝利之時，一部分國民黨人便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義，破壞了國共合作，使革命遭到了失敗。

自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和國民黨內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圍繞著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這一問題，進行了長時期的鬥爭。十年內戰時期，國民黨當局把三民主義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概念，在實踐中完全反對實行國民黨「一大」宣言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結果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新軍閥統治，招致外患乘機而



孫中山著《三民主義》合訂本封面及其扉頁。

入。這時，只有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繼續堅持並發展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旨在滅亡中國的侵華戰爭後，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推動下，實現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當時全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在解放區內，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實踐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宣言，而在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則頑固地同革命三民主義反其道而行之，堅持獨裁統治，繼續反共反人民，並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惜發動革命的內戰。他們終於自食其果。

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了一個真理：「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為了建立一個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廣大的中國人民，包括忠實於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的那些國民黨人在內，英勇奮鬥，許多先烈為此而付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在孫中山死後中國革命繼續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極大的豐富與發展，這正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獲得成功的可靠保證。

三、嚮往社會主義

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先行者。孫中山畢生都在學習西方，博採眾長，早期仿效西方共和政治，晚年主張以俄為師，他的思想志趣，是吸納世界一切先進的思想為我所用。他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表現得尤為顯著。

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早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孫中山就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企盼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之後，他終其一生嚮往並大力宣傳社會主義，還曾努力號召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國家。

什麼是社會主義呢？孫中山一再聲稱：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⁵⁶又指出「社會主義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他認識到馬克思對社會問題研究得「最透徹和最有心得」，「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集幾千年人類思想之大成」，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因而叫「科學社會主義」。但是他不同意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而認為美國學者摩里斯·威廉所稱：「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生存為重心」，才和他的主義「若合符節」。孫中山說，民生主義的「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他的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

民所共用」。即「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⁵⁷

這裡，孫中山正確地理解了中外古今的社會主義理想中的共同特徵，即「共產」，亦即實行政治、經濟、文化所有權和分配的平等，特別是實行「土地公有」和「資本公有」，即實行主宰國民經濟命脈的土地、森林、礦山、鐵路、電氣、郵政等部門和主要企業的國有制，在這一基礎上實行「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以「消滅商人的壟斷」。⁵⁸他認為這是馬克思的「資本公有」和亨利·喬治「土地公有」二者的綜合，以補救歐美社會因未及早解決土地問題而生的日後財富壟斷之弊。他讚賞歐洲空想社會主義、中國黃老所說的華胥氏之國和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但那時沒有力量去改良社會，「所以只好說理想上的空話」，因此他強調當今之世必須大力發展生產，搞近代化，謀求「社會的文明的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走「社會進化」、國強民富的路。他認為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

57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百九十四頁。

58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百六十八、三百七十八頁。

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仿歐洲之學說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孫中山

孫中山語錄。

力」，通過它，「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⁵⁹這裡，僅就上述理想本身而言，應該說是高出於中外烏托邦理想，其中實行公有制、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必備條件，尤中肯綮。他所提出的以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來決定能否實行社會主義的論點，也發人深思。

如何實行社會主義呢？

孫中山是不贊成馬克思的「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的理論，「他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於未然』的預防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貧富不均的大毛病」。⁶⁰孫中山主張分階段採取不同的方針和辦法，即主張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用和平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改良社會」。應該說，這一想法是頗具匠心和卓識的。

孫中山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認識，絕非偶然。它既與二十世紀初的思潮特點和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有著聯繫，又是他經過長時期學習和研究的結果。

孫中山早在一八九七年在倫敦時，就著手「研究了馬克思、喬治、穆勒、孟德斯鳩以及其他人」。⁶¹曾對各派社會主義學說做過一番苦心研究。孫中山曾自稱此時「始知徒致國家富強、

59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百六十一—三百六十一頁、三百八十一頁、三百八十六頁。

60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五百八十頁。

61 [美]史扶鄰著，丘權政等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百一十九頁。

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⁶²之後，孫中山在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三年旅居日本期間，與社會主義思潮有了更多的接觸。他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強烈刺激下，開始瞭解到什麼是階級鬥爭，什麼是社會革命，對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進一步有了一些認識。

一九〇二年，孫中山旅居日本時，在與章太炎討論為何改革中國土地制度時，還曾批駁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說：「彼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⁶³其後，隨著對社會主義學說瞭解漸多，特別是通過「與日本平民社領導人幸德秋水交往，就社會主義的實行問題交換意見」。⁶⁴一九〇三年九月，孫中山離日赴檀香山；同年十二月，他從那裡致函國內，明確表示他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提出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他說：「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歐美之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夫歐美演此懸絕之慘境，他日必有大衝突，以圖適劑於平。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為平均而設，為教育，改以平均知識，宮室衣服，所以平均身體的熱度，推之萬事，莫不皆然。則歐美今日之不均，他時必有大衝突，以趨劑於平均，可斷言也。然則今日吾國言改革，何故不為貧富不均鬥，而留此一重罪業，以待他日更衍慘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故弟欲於革命時一起做

62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三十二頁。

63 章太炎：《定版籍》，《噓書》修訂本。

64 《孫中山年譜》（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十九頁。

起。」⁶⁵之後，他還曾努力號召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國家，呼籲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協助他「把中國建立成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〇五年初，孫中山由美抵歐在中國留學生中從事革命宣傳組織活動。同年二月，他曾在布魯塞爾專程到第二國際書記處訪問社會黨國際局主席王德威爾德和書記胡斯曼，要求加入第二國際。孫中山在與他們談話中曾反復表示，「中國社會主義者要採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中國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而決不成為它的糟糕的犧牲品，這樣，「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孫中山說：他要與第二國際社會黨的原則「更趨一致，防止往往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如像歐洲國家曾發生過的那樣」。⁶⁶

孫中山是為著救國而虛心向外國學習，力圖適應世界新潮流，而外國繁多的社會主義流派又各有長短；並且中國近代社會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後所具有的多種經濟成分、多個階級、多種思想、多條道路並存的過渡社會特徵又特別顯著，有如孫中山深切感受的：當時各種新思潮、新出版物「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⁶⁷孫中山從來以人民全體的代表自任，這時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觀，因而更重視當時在中國有影

65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66 伯納爾：《孫中山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近代史資料》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67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二百零一十頁。

響的一些社會主義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納更廣泛的主張，爭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事業。

孫中山從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響？

按照孫中山的說法，他已知道有關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派別起碼有五十七種之多，研究學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千百種，而當時「普通人對社會主義無所適從」。

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誠然有不少誤解，但他不僅對它有所瞭解，而且確因涉獵過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學說，並且對各種名目的共產黨、社會黨進行了比較、分析和研究。比如：他對出現於社會主義運動初期的「均產派」提出的「合貧富各有之資財而均分之」的主張並不贊同，認為它雖激烈卻很粗淺，「於事理上即未能行，而徒然肇攘奪變亂之」。他也不贊成「烏托邦派」，說他們都是一些悲天憫人的道德家，只寄託於子虛烏有的安樂世界，講些「理想上的空話」，而絲毫沒有提出「消滅人類的痛苦」的具體方法。應該說這對於極「左」和無政府主義的認識是很到位的。孫中山最為推崇的是馬克思的「科學派」，即「科學的社會主義」，認為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中的聖人」，「專從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之解決，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各國社會主義學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麥克司（即馬克思）之學說，主張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之解決」。⁶⁸他對感興趣的各種社會主義理論並未全部照搬，而是有所取捨增刪。例如他曾強調「以俄為師」，但不贊成俄國用革命手

段來解決經濟問題。他欣然引美國學者摩里斯·威廉的《社會史觀》為其民生史觀的同調，並把其消費論納入民生主義的範圍，但他並未像威廉那樣採取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他讀過柯爾等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費邊主義、工團主義的論著，並稱讚羅素為深知中國的大哲學家。他們的某些思想資料，也被孫中山用於適應國際和中國勞工運動的新變化，把革命運動與工農運動直接聯繫，但他不贊成基爾特的「產業自治制」，堅持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主張。他肯定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但他認為俾斯麥使用鐵血的手腕是世界民權的大障礙，而在民主政體下實行社會主義為得當。他不滿足於「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恢復古代的共產制度的願望，而是追求在「工業發達，機器創出」、物質財富日增、「人與人爭的極劇烈時代」產生能消除不平的「新共產時代」。

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勝利回國時，專門帶回了多種「歐美最新社會主義名著」，準備要「廣為鼓吹」。一九一二年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後，曾應社會黨邀請，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工人階級最集中的上海，連續三天演講社會主義各派學說。他不僅向社會黨，而且向各行各業群眾宣傳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孫中山一生宣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最多的時期。一九二四年，他在廣州所作《民生主義》演講，則是他再度談論社會主義最多也是最後的一次。

孫中山一再告誡國民黨人：「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

且是一個好朋友」。⁶⁹這既是出於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有較好的瞭解的肺腑之言，也是確實適合中國人民的需要和世界潮流發展的至理名言。

當然，孫中山嚮往的社會主義及其實現辦法，具有不少空想的成分，它本身也存有矛盾及與現實的差距，它同今天中國大陸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有差別。但是，要求生產力高度發展，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控制，國家經營的事業居於主導地位，生產的成果為全體民眾所共用等等，都表現了同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不一樣的發展路線和發展方向。孫中山看到了中國在建設具有自身特點的現代化時，自覺地吸收和利用外國資本主義既有物質生產成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就為解決所遇到的難題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孫中山是為謀求中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相連接的工作做出最多、最可貴探索的傑出先進人物。

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熱切嚮往，大力宣傳，完全是出於對苦難大眾的深切同情和實現祖國現代化的善良願望。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可貴의思想和活動，值得人們學習和研究。

四、黃埔建軍

武裝鬥爭是革命鬥爭的最高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都握有龐大的反革命武裝，人民大眾要達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採取武裝

鬥爭的形式，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裡早已指明了的普遍真理。

孫中山在拯救中國的漫長歷程中，雖直覺地看出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但對依靠什麼性質的武力分辨不清，他先從聯絡舊軍隊搞軍事冒險，後到依靠軍閥武力，因而屢遭失敗，辛亥革命後表現得尤為顯著。他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歷程，直到晚年，通過事實的教訓，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才醒悟到組建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提出了革命必須有武力，而武力必須和人民相結合的正確論斷，並努力地進行建設革命武裝力量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走武裝革命鬥爭之路，必須有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要有一支強有力的物質力量——軍隊。孫中山對依靠什麼性質的武力進行武裝鬥爭，不僅在辛亥革命前分辨不清，並且在辛亥革命後也是教訓至深的。他從事武裝鬥爭的中前期，是依靠聯絡會黨、吸收綠林勢力和改造、利用舊有的軍隊。後來，又把軍閥武裝當作依靠力量。結果事與願違，遭遇到一次比一次慘重的失敗。

利用軍閥的結果，反為軍閥所利用。客觀形勢表明必須有堅強的革命武力，才能挽救革命政權被顛覆的危險。現實的慘痛教訓，促使孫中山深感組織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及其極端的重要性。他認真總結了過去的鬥爭，認為革命沒有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黨基未固」；進而明確指出：「黨之基礎何在，在於軍隊。」並舉蘇俄共產黨為例，說明他們能在「三數年間將內亂外患依第勘定者」，就因為有為主義而戰鬥的革命軍隊的緣故。強調「應效法俄人」。

稍後，他還說：「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有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⁷⁰由於有了這樣的認識，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前後，便毫不猶豫地採取蘇俄紅軍的經驗，著手開辦軍校，創建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

黃埔軍校的原名是「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一九二六年一月改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它是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以及列寧、史達林派遣的顧問人員幫助下，國共合作創辦的為培養革命軍事幹部建立起來的軍事政治學校。校址設在廣州市南二十多公里的黃埔島上的長洲島，小島方圓約十平方公里，依山傍水，樹木蔥蘢，島上要塞炮臺環列周圍，如一道天然的屏障。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主持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同蔣介石（中）、何應欽（左）、王柏齡（右）在軍校辦公樓的走廊合影。

這裡，原先是清朝水師學堂舊址，後曾經辦過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

黃埔長洲島四面環水，進退自如，地當樞要，不失為軍事要地。孫中山認為，在這裡興學講武，可謂鬧中取靜。便指定該地為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因為校址始設於黃埔島上，一般通稱為黃埔軍校。

早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孫中山就決定，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團長由蔣介石擔任，其中有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等共產黨人參加。該代表團在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參觀了蘇聯紅軍和各種軍事學校，學習了赤衛軍的訓練和組織，瞭解到建軍的一些經驗。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國民黨黨務討論會通過了「設陸軍講武堂於廣州」的提案。接著，辦理國民黨改組工作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了這個方案，決定命名為「國民黨軍官學校」，呈請孫中山親任校長。孫中山毫不猶豫地決心採納蘇聯紅軍的經驗，著手建設自己的武裝力量。指派廖仲愷和鮑羅廷一起具體籌畫開辦學校和選定教職人員。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孫中山便下令籌辦中國國民黨



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

陸軍軍官學校，指派蔣介石為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委員有鄧演達、王柏齡、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七人。

孫中山又在會議閉幕後，於百忙中約見鮑羅廷和蘇聯顧問，告知：「我們的首先任務是按照蘇聯式樣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

大會結束後一周，二月六日，孫中山下令於廣州南堤設立黃埔軍校籌備處，積極進行具體的籌建工作。

孫中山把辦好黃埔軍校視為大事，並為此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他原決定親自擔任校長，負責領導工作，後來另派蔣介石專任校長職務，自兼軍校總理。⁷¹任廖仲愷為駐校的國民黨代表。

為了使黃埔軍校的各項工作儘快落實，孫中山一方面請馬坤等人向英、美、加各國聘請教官，一方面打電報給駐北京的蘇聯大使，請他協助延聘蘇聯顧問。當時，列強各國只承認北京軍閥政權，不承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政權，因此，從英、美等國招聘教官很困難，只有鮑羅廷率領了一批蘇聯顧問來到了廣州。

從軍校籌備處成立到開學，歷時三個多月，先後召開了三十二次會議，議定了計畫、編教材、佈置校舍、制定校章、任命教員、進行招生等工作。

71 《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概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事錄》，廣州一九二四年印本，第五十三頁。

關於軍校的招生工作，廖仲愷明確提出，選拔學生要特別注意，「要其人明白本黨主義，且誠實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選」。當時，除廣東可以公開招生外，其他各省都在軍閥控制下，只能秘密招生或動員青年到廣州投考。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各地組織也注意選送黨、團員和進步青年投考。北京、上海、武漢、長沙、濟南等地區的黨組織，介紹了大批黨團員和青年工人前來投考，其人數之多，占了應考生的一大部分。

三月二十七日，各地前來報考的考生集中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參加總複試。四月二十八日揭曉，在一千二百多名考生中，錄取正取生三百五十人，備取生一百二十人。稍後，四川省繼續送來二十人，軍政部長程潛辦的講武堂又來了一百多名學生。

五月五日，軍校正式開學上課。六月十六日，軍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是日清晨六時，孫中山偕夫人乘「江團」號炮艦由「江漢」號軍艦護衛從大本營出發，前往黃埔，參加軍校開學典禮。

整個黃埔洋溢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當孫中山、宋慶齡款款地登上長洲島時，恭候已久的全體師生，早已列隊在校門兩旁奉迎。學生們一律穿著中山裝式的黃色嗶嘰布軍裝，一個個精神飽滿，朝氣蓬勃。孫中山、宋慶齡在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的陪同下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教室、宿舍、辦公室、圖書館，接見了各隊教官及隊長。十一時，舉行開學典禮，宋慶齡陪同孫中山登上主席臺，旁邊是蔣介石和廖仲愷。

開學典禮在操場舉行，主席臺上放著一張鋪著白布的長方桌，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

旗交叉豎立在主席臺正面，正中央掛著軍校校訓：「親愛精誠」。兩邊的對聯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身穿白色中山裝的黃埔軍校總理孫中山親自主持開學典禮。先請黨旗、校旗就位，大家向黨旗三鞠躬後，興致勃勃地一起唱校歌。歌詞曰：

莘莘學生，親愛精誠，三民主義，是我革命先聲。革命英雄，國民先鋒，再接再厲，繼續先烈成功。同學同道，樂遵教導，終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灑花，以校作家，臥薪嚐膽，努力建設中華。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做奮鬥的先鋒！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攜著手，向前行；路不遠，莫在驚。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本校精神，發揚本校精神。

之後，由總參議胡漢民代孫中山宣讀了「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訓詞」。胡漢民雙手捧訓詞，肅立在孫中山身邊大聲宣讀。訓詞曰：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諮爾多士，為民前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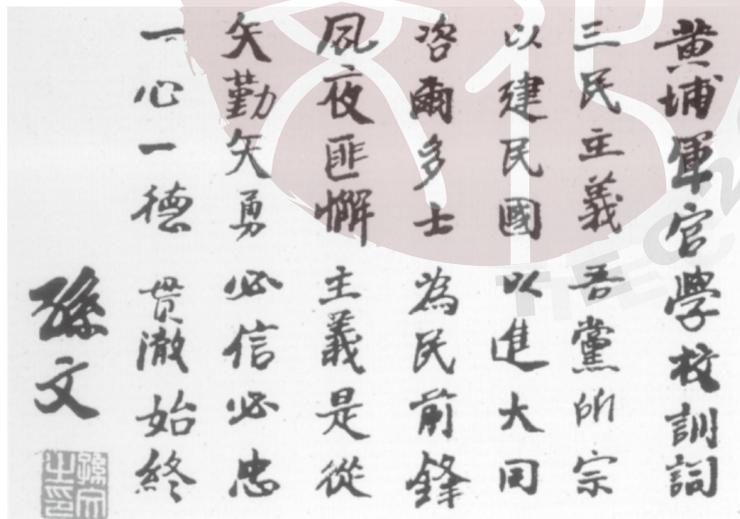
夙夜匪懈，主義是從。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孫中山這一黃埔軍校的訓詞，後作為了黃埔軍校的校訓，後來又成了為國民黨的黨歌和中華民國的國歌。

面對熱烈赤誠、抱著救國大志的軍校學生，孫中山充滿激情地做了《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演講。他指出創辦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在這十三年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強調要接受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學習蘇聯的榜樣，建設革命軍隊，我們便可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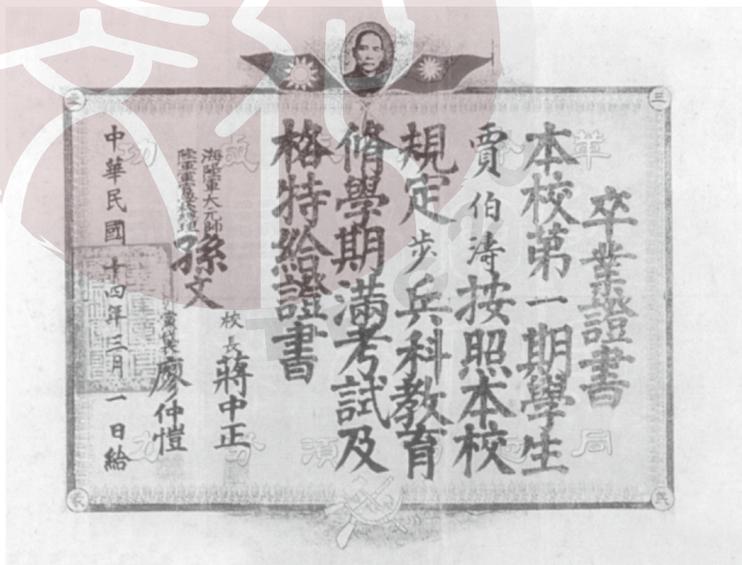


孫中山手書的黃埔軍校校訓。

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

演說中，孫中山特別要求學生要有高深的學問做根本，「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功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捨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

蘇聯政府按照孫中山的請求，也先後派遣了數十名軍事幹部組成顧問團到黃埔軍校工作。第一批應邀到黃埔軍校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小組成員有：捷列沙托夫、捷爾曼、波良克、契列帕諾夫。一九二四年初，他們由鮑羅廷介紹給孫中山。據契列帕諾夫的回憶，當時孫中山



黃埔軍校畢業證。

坐在沙發椅上，手杖放在兩膝間，雙手交叉，正在和軍事部長談話，當蘇聯軍事顧問小組的成員走進屋時，孫中山站了起來，他沒有任何「中國禮節」，而是像慈父一樣簡單地向大家問好。孫中山在接見蘇聯軍事顧問小組成員時十分高興，他說：「我們要按照蘇維埃的軍事制度來組織革命軍隊。要在南方建立北伐戰略基地。你們在從國內驅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得到了豐富的經驗，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把這些經驗傳授給我們的學員——革命軍隊未來的軍官們。」之後，蘇聯的軍事顧問們以他們豐富的作戰實踐經驗和軍事理論，積極開展了教學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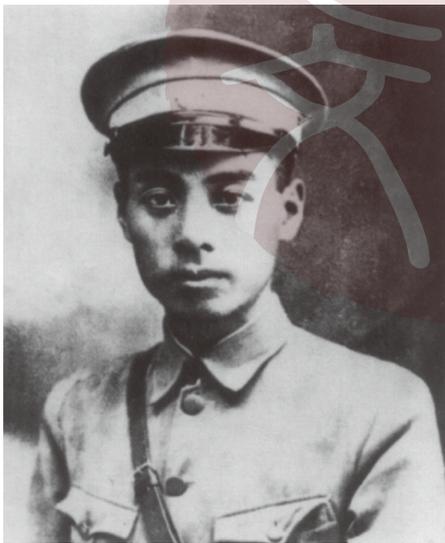
黃埔軍校早期的編制，設總理、校長和黨代表，組成校本部。總理是學校最高領導，統理一切。校長在總理之下處理校務事項。黨代表對學校實行監督和指導，務使學校人員遵守革命政策，凡屬學校書文、命令，沒有黨代表附署一律無效，從而保證黨的主義和政策得到了貫徹。後來黨代表和政治制度一起推行到國民革命軍各級部隊中去，成為國民革命軍區別於過去一切舊軍隊的主要標誌。同時，也是使部隊能夠有旺盛的戰鬥精神，並能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深得群眾擁護的一個重要因素。

軍校總理孫中山，校長蔣介石，副校長李濟深，黨代表廖仲愷。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不久離廣州，邵元冲代理），副主任周恩來（年三月擢升主任兼軍校軍法處長），政治秘書聶榮臻、魯易。教練部主任李濟深，副主任鄧演達。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副主任葉劍英。軍事總教官何應欽，學生隊總隊長鄧演達，副總隊長張治中。政治教官有惲代英、蕭楚女、包惠僧、

周逸群、韓麟符、熊雄、胡公冕、高語罕等。國民黨政治總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也參加軍校的工作。軍校總顧問是契列帕諾夫，政治顧問是喀夫覺夫，步兵顧問是白里別列夫，炮兵顧問是加列里，工兵顧問是互林。他們都是蘇聯派來的政治、軍事幹部。

孫中山、何香凝、鮑羅廷、毛澤東、劉少奇、鄧中夏、蘇兆征、吳玉章等都曾到軍校講演，向學生進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教育。

黃埔軍校的創立，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的新事物。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就出現了仿效外國方法培養近代軍事人才的學校。與黃埔軍校同時，幾乎較大的南北軍閥都有自己的軍校，如北方的保定軍官學校和南方的雲南講武堂等，但是黃埔軍校的辦學宗旨和其他軍校有著根本的不同。孫中山說：「北方的官僚軍閥老早便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他們之位，都是比他們差得遠」；可是，舊式的軍隊、軍校的官兵「不是為升官發財，就是為吃飯穿衣，毫沒有救國救民的理想和革命的志氣」。孫中山的這番話明確地指出了黃埔軍校區別於其他軍校的根本所在。黃埔軍校和其他舊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任職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

軍事學校有本質的不同，它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革命軍事學校，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同心協力的國共合作的產物。它的創設，為建立革命軍隊打下了基礎。

黃埔軍校的特點，是吸取了列寧建立紅軍的經驗，貫徹執行政治與軍事並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政治課程有三民主義、社會主義、蘇聯研究、社會發展史、各國政黨史、各國革命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政治學、經濟學、軍隊政治工作等二十六門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確定革命的觀點，不僅知道槍是怎樣放法，而且知道槍要向什麼人放。

軍事教育方面，黃埔軍校作了較大的革新。縮短了學習時限，除了借鑒日本士官學校的教練方法，參合保定軍校的經驗，主要講授蘇聯紅軍經驗的新戰術。軍校的軍事教官有保定軍校畢業的，有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還有蘇聯的軍事顧問。學生的教材都是從日本、德國、法國翻譯過來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

孫中山認真研究了蘇聯的革命經驗，認為建設軍校，必須有革命的制度，所以在黃埔軍校中實行了黨代表制度，建立了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孫中山在那個年代的比較完備的建軍思想。

黃埔軍校成立後，軍校槍支很少，只夠守衛學校用。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顧問團電請蘇聯政府贈送一批軍械。

一九二四年，蘇聯政府派遣一艘六千噸級的由商船改裝的巡洋艦，裝滿了彈藥武器，為

了避免帝國主義的耳目，繞道來中國，進入珠江，停泊在學校附近江面。當軍校師生們聽說蘇聯贈送的軍械來了，無不歡欣雀躍。

為了辦好軍校，孫中山竭盡全力。當時，黃埔軍校的學生學費、宿費、伙食費，甚至連服裝費、書籍文具費用，都是政府供給，而這些經費的籌措，成了孫中山和廖仲愷最棘手的问题。因為廣東財政部和廣東兵工廠，都在滇系軍閥楊希閔手中。楊希閔表面上雖然接受孫中山指揮，實際上把持財政，多方面阻撓黃埔軍校的創建。為了軍校的經費，廖仲愷不得不與廣東軍閥周旋。他為黃埔軍校傾注了大量心血。黃埔軍校，正是在這樣艱難困苦條件下，成長起來的。

一九二四年十月，黃埔軍校根據孫中山「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召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的指示，設立了軍校教導隊共兩個團。教導隊如黃埔軍校一樣實行黨代表制。至此，創建革命軍的工作粗具規模。據曾經擔任過孫中山的上校副官、加拿大人馬坤回憶：黃埔軍校創辦的時候，廣州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個滇軍抵得兩三個粵軍。」可是，當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軍官分配到各營團去擔任教官之後，人們看法就改變了，開始傳頌「一個粵軍抵得兩三個滇軍了」。

黃埔軍校，不僅僅是把一個普通人訓練成了一名軍官或士兵，還在於它對士官們進行了有關軍人職責以及為什麼作戰的政治教育。第一期不分科，學制為六個月，第二期以後分步兵、工兵、炮兵、輜重、政治等科。正式學制分別是六—九個月。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共六百四十五人，同年十一月畢業後，孫中山以他們為骨幹組織革命軍隊，規定部隊的所有成員要從「廣東的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忠心革命同志中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⁷²這是一支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部隊，每連的軍官中有近半數是共產黨員。⁷³這支部隊，後來逐步發展為國民革命軍，成為後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戰爭的基本力量。

黃埔軍校在廣州共辦了四期，培養學生近五千人。他們大都成了創建和壯大國民革命軍的中堅力量，有的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領導人。

綜上所述，概括言之，孫中山這次黃埔建軍有三個突出的特點：

首先，是在學校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並於五月七日委派廖仲愷為駐黃埔學校的國民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等先後在該校負責政治工作和擔任其他重要職務，以革命精神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幹。後來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一起推行到國民革命軍各級部隊中去，成為國民革命軍區別於過去一切舊軍隊的主要標誌。

其次，教學內容的改變是軍校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它「是軍事和政治的訓練並重，目的

72 《致蔣介石書》，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二百一十八頁。

73 覃異之：《黃埔建軍》，《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十一頁。

在使武力為主義所驅使，而妨礙（止）脫離群眾的弊病」。⁷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軍校極其重視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除正式課程外，經常舉行各種內容的講演會，努力提高學生的政治覺悟和戰鬥意志。正如當時一個軍校幹部所說的：「革命軍必擁護工農利益——最大多數被壓迫民眾的利益，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打倒軍閥！革命的策略，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蘇俄、各國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我們每天討論的問題，都不外工農問題，聯合戰線問題，黨的組織問題。」⁷⁵當時講演者除孫中山、廖仲愷外，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共產黨人最受學生歡迎。在軍事教育上，遵循紅軍建軍的經驗，安排各項軍事科目的進度和日程，定出詳細實施辦法，重新編訂了典範、令和戰術、兵器，築城、地形及交通通訊等教程，要求軍事訓練後「能夠有充分作戰的能力，為黨的主義有切實把握能殺敵致果」。⁷⁶第三，學生階級成分和政治品質的大變化是軍校的又一突出特點。它選拔學生的要求是嚴格的，「要其人明白本黨主義，且誠實可靠，能做事」；⁷⁷文化程度上，「投考資格是限中學畢業，身體強壯的，而大學專門生是很多，日、德、

74 《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覆駐比支部信》，廣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編：《革命軍》，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百〇七頁。

75 懋廷：《引言》，黃埔軍民聯歡大會編：《武力與民眾》，第一百一十二頁。

76 惲代英：《黨紀與軍紀》，《革命軍》第十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第二十頁。

77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錄》，廣州一九二四年印本，第九十九頁。

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
斷無成就

孫文

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孫中山題詞手跡。

法的留學生也有」。⁷⁸當時，全國各省都在軍閥勢力控制下，招生工作除廣州外，只能秘密地進行。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各地組織，對這一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應考者大部分是共產黨的北京、上海、武漢、長沙、濟南等地區組織所遴選介紹的黨團員和青年工人、學生。一九二四年入學的第一、第二、第三期學生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他們多是農民、工人的兒子，窮苦的中學生、大學生，被壓迫而跑上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並且，其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占相當大的比重，如第一期學生六百來人中就有共產黨員八十多人。⁷⁹當時蔣介石也承認：「在事實上說，共產分子是本校本軍為最多。」

78 《革命軍》第九期，第一百〇七頁。

79 覃異之：《黃埔建軍》，《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九頁。

上述諸特點使黃埔軍校和其他舊的軍事學校有根本性質的不同，它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革命軍事學校，是共產黨出力很多的國共合作的產物。它的創設，為建立革命軍隊打下了基礎。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黃埔軍校舉行的開學典禮上，孫中山指出，創辦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將來挽救中國的危亡」。當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後，便以他們為骨幹正式組織革命軍隊，規定部隊的所有成員要從「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這是一支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部隊，每連的軍官中有近半數是共產黨員。⁸⁰這支部隊，逐步發展為國民革命軍，成為後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戰爭的基本力量。

歷史證明，黃埔軍校，以首創了嶄新的革命制度，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赫赫戰功，培養了大量的軍事政治人才，以及校記憶體在著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兩種思想和勢力的激烈鬥爭，而揚名中外。它在我國近現代革命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產生過深遠的影響。⁸¹

與此同時，孫中山還注意改造舊有軍隊的工作。他認識到「良好之農民化而為強暴之兵匪」的根源，是中國「近代受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壓迫及國內軍閥官僚之剝削，遂致失業日多，

80 覃異之：《黃埔建軍》，《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十一頁。

81 黃埔軍校從第五期隨北伐軍遷至武漢。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一九二八年三月，黃埔軍校又遷至南京，改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饑寒所迫，或行劫掠，以圖苟全，或入行伍，以求倖存」。⁸²所以，主張要以全力對遊民土匪及軍隊宣傳革命的主義。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對此問題通過了專案，要求「努力宣傳於一切軍隊中，使瞭解於其（自）身之地位，變反動之兵力為革命的兵力」。⁸³

在改造舊有軍隊具體措施上，先整頓軍紀，限制擴充軍隊和取締有名無實的軍隊番號。在一九二三年一年中，解散廣州市內掛牌的各路司令、支隊六十餘處。一九二四年二月，又命令未被核准的各種名目（如遊擊、別動、挺進、梯團、支隊等）的部隊，統統予以整編。

由於孫中山當時沒有完全放棄「來者不拒」的收編軍閥部隊的老辦法，因此，擁擠在廣州的部隊達二十萬人之多，他們名為革命政府下的軍隊，實則各自為政。為使這些軍隊變成革命隊伍，孫中山於同年七月命令設立軍事訓練委員會，加強部隊的軍事和政治訓練工作。並親自對各軍官兵講演三民主義及救國救民的道理，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但是，他還沒有派遣革命的骨幹力量去作深入的政治工作和細緻的組織工作。後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各軍中都派去黨代表，設立政治部，許多共產黨人在各軍政治工作中擔任重要職務，對改造舊軍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國民黨右派的阻撓破壞，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那些舊軍隊的素質。

82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廣州一九二四年印本，第八十四—八十五頁。

83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廣州一九二四年印本，第八十四—八十五頁。

五、首次國共合作的積極捍衛者

國民黨內部的成員頗為複雜，思想有激進、保守的明顯分歧，特別是一些資深黨員更是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孫中山的革命政策。所以，在推行國共合作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在國民黨改組前後，黨內積極擁護和贊助孫中山的幹部，只有廖仲愷、宋慶齡、何香凝等一部分極少數左派。而反對這一主張的卻為數甚多，有馮自由、鄒魯、張繼、鄧澤如、胡漢民等右派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們極力反對國民黨的革命化，反對國共合作。

這些右派分子是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實際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他們不顧孫中山的多次告誡，在各地蓄意製造矛盾，興風作浪。這批人，有的是公開反對，使用無理取鬧、聯名上書、組織小集團、制造反革命輿論、爭奪代表席位等種種卑劣手法，進行阻撓和破壞；有的則陽奉陰違，消極怠工，表面隨和，暗中反對。這批右派在國民黨內有相當影響，並且包圍著孫中山。孫中山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巨的努力。

孫中山不愧為一個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他一旦認清了什麼是正確的潮流，就堅定不移地順著潮流前進，其革命的決心並沒有因此而動搖。他和國民黨右派勢力進行了激烈、尖銳的鬥爭。

當右派分子提出反對聯合共產黨的主張時，孫中山指責他們說：你們「站在革命隊伍

的後面，革命的青年前面去了，你們還在說他們什麼呢！」⁸⁴他容共的主張既誠懇又堅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回答宋慶齡提出「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他明確地指出：「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⁸⁵他堅決主張吸收革命分子，歡迎中共黨人大批加入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黨政軍機關工作。當右派分子以退黨來要脅孫中山取消決定時，孫中山勃然大怒，厲聲說道：「你們不贊成改組，可以退出國民黨！」

孫中山充分認識到要救治正在墮落中的國民黨就需要新血液。在他看來，共產黨人就是使國民黨起死回生以推進國民革命的新血液，所以孫中山視國共合作如生命，用一切辦法來維護國共之間的團結，捍衛兩黨的革命聯盟。

早在國共合作醞釀的過程中，孫中山對右派分子曾多次進行批評。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他就對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彈劾共產黨的上書作了批示，說明了國民黨改組和聯合蘇聯的必要，告誡他們「一切不可疑神疑鬼」。⁸⁶後來，又發表了《致全體黨員書》，詳細解釋聯俄、容共的必要和重要，指出那些散佈謠言的人，「不是出於敵人破壞的行為，就是屬於毫無意識的疑慮」。⁸⁷為了排除右派頑固勢力的干擾，在代表大會前夕，孫中山除嚴厲駁斥了他們的反

84 惲代英：《孫中山先生逝世與中國》（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載《孫中山先生與中國》，民智印刷所一九二五年五月版，第二十七頁。

85 《儒教與現代中國》，《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一〇九頁。

86 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上海正中書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三百〇一—三百〇八頁。

87 孫中山：《致全體黨員書》，上海《國民日報》，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動謬論外，並且把阻撓改組、在會議上無理取鬧的張繼驅逐出會場，加以囚禁；代表大會後，又把破壞聯共政策的代表人物馮自由等開除出黨。

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右派仍然頑固不化，不斷挑起事端，以致鬥爭一直持續不斷。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黃季陸、孫科向中央黨部遞交提案，要求「制裁」共產黨。十八日，曾受孫中山嚴厲斥責而有所收斂的鄧澤如，違背大會決議，夥同張繼等人以監察委員名義，向孫中山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書」，攻擊共產黨並要求「從速嚴重處分」，掀起了一次反共惡浪。接著，八月一日，上海有一批國民黨員致電孫中山，請求「命令該共產黨員全數退出本黨，並予傾向共產黨者以嚴重制裁」。在此期間，上海、北京、武漢、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右派分子，相繼提交「彈劾」共產黨的議案達二百餘件，並印發了反對國共合作的《護黨特刊》；廣州《民國日報》、《民權旬報》及北京《民生週報》等報刊上，也紛紛出現「清黨」文章。國民黨中央監委會一九二四年提交中央執委會的十件議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對國共合作的。

孫中山為解決容共政策所引起的各種誤解、反對和糾紛，曾經多次堅定表明要維護國共合作的決策。

早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初，孫中山就發表《通告黨員解釋本黨改組意見書》，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彼此既志同道合，則團體以內無新舊分子之別，在黨言黨，惟有視能否為本黨、為主義負責奮鬥而定其優劣耳」。到七月初，又發表《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再次重申容

共主張，鄭重聲明：「本黨既負有中國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國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明確指出要「推誠延納」一切革命分子，要求全體黨員「摒除疑惑」。

在八月間，孫中山還當眾訓斥了主張解除國共合作的張繼，甚至斷言說：「我們的同志，還有我們的軍隊，只有當命令對他們有利時才服從，反之往往拒絕服從。如果所有的國民黨員都這樣，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⁸⁸在同月中旬，他還特別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維護國共合作問題，並審定和發表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於全體黨員之訓令》。《訓令》中再次肯定了代表大會決定的容共政策，明確指出：國民黨容納共產黨是為了團結和集中革命的勢力，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也是為了團結和集中革命的勢力；國共兩黨都是為著完成國民革命事業、目標一致而合作的；所謂「因為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主義遂以變更者」，是極端錯誤的。他告誡全體國民黨員應當對於「前此爭議，付之淡忘，惟相與努力於將來以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

這一時期，孫中山再三強調說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好朋友，國民黨員不能反對共產黨員。他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共同願望的。因此，他堅定地維護國民黨的革命方針，維護國共兩黨的合作，在同國民黨右

8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譯：《蘇聯（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九二〇—一九二五），第一卷，北京圖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五百二十六頁。

派勢力進行鬥爭中，態度鮮明，毫不動搖。孫中山多次對宋慶齡說：「國民黨裡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這些話反映了孫中山反對右派分子和他敗類的堅定立場。

孫中山還針對右派隊伍的複雜情況，利用歷史的淵源、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經驗，採取了區別對待的辦法，以利於爭取團結和分化。從而使一些矛盾得以緩和，一些鬥爭暫不激化，遏止了右派勢力的倡狂進攻。

也正是孫中山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和在黨內長期形成的權威，在複雜的鬥爭中，維繫著左右派之間的平衡，從而指導國民革命能在驚濤駭浪中向前推進，保證國共合作得以順利向前推進。

孫中山的國共合作主張，在當時得到了許多國民黨人的擁護。廖仲愷在這一場激烈鬥爭中，竭力協助孫中山，同國民黨右派勢力進行了不斷的鬥爭。他「很勇敢很堅決地去幹」，毫不妥協與動搖，在國民黨改組的整個過程中，「是始終贊助最力的一人」，⁸⁹堪稱國民黨改組的堅強支柱。

廖仲愷曾理直氣壯地說：「應該懂得只有聯合其他革命政黨的力量，我們才能實現革

命！」並宣稱：為了國家，「無論何人反對，我都不怕，就是擊我殺我，也在所不惜」。⁹⁰他竭力促成並忠實執行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歌頌列寧「是打破帝國主義的實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為被壓迫民族奮鬥，為無產階級奮鬥」；⁹¹並親切地接待蘇聯派來幫助中國革命工作的友人，誠懇地和他們共事。同時，他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排除掉右派頑固勢力的種種誣陷和破壞，真誠地和共產黨人維繫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全力推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政綱。

當時，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都深知國共合作是中國革命所必需，因而堅決擁護，大力贊助。宋慶齡為幫助孫中山推行三大政策，真誠地對待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友人。鮑羅廷夫人鮑羅廷娜非常讚揚宋慶齡對蘇聯友人的真誠和熱情。她這樣追憶說：「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對我們以及對所有的蘇聯同志很熱情友好，她一直積極參加她丈夫的政治活動。我們與她來往同樣也可不用翻譯，因為她的英文相當好。宋慶齡向我講述了很多關於中國婦女的饒有趣味的事情，介紹我認識了社會各階層的很多女代表，我後來曾不止一次與她們見過面。」⁹²歷史證明，宋、廖、何、柳等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

90 何香凝：《在粵軍追悼廖陳二公大會演說詞》，《廖仲愷先生紀念集》，一九二七年版，第十七頁。

91 《追悼列寧大會演說詞》，《廖仲愷集》，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第二百四十一頁。

92 中·C·鮑羅庭娜：《孫中山的顧問》，載《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紀念（一八六六—一九六六）》論文、回憶錄和資料記編》，莫斯科一九六六年俄文版。

此外，還有不少人，眼見國民黨處在危難之中，如果沒有來自國內和國外革命的支援，確實難以有所作為，因而在某種意義和角度上（如希圖外援）也都贊成孫中山的容共政策。

至於在反對國民黨改組、抗拒三大政策的人當中，也有不少人接受了孫中山的教導，承認錯誤，贊成三大政策。只有那些雖經孫中山反復理喻，卻死硬到底的人，後來才跟著蔣介石公開走上了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道路，最終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破裂。

這次國共合作，不僅推動了革命的大發展，實現了北伐大業，還為此後的中國革命和建設樹立了一面兩黨並肩戰鬥的旗幟，成為後繼者借鑒的楷模。

一九三七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之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再次攜手，從而實現了抗日救國大業，有力地促進了民族的進步。

今天，當億萬炎黃子孫正在為完成祖國統一、振興中華大業而奮鬥的事業中，首次國共合作的經驗與教訓，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國共兩黨合作，共謀祖國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乃是今天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所有熱愛祖國的人，都應當學習孫中山，繼承和發揚他的國共合作思想，積極謀求儘早實現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大業，以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首次國共合作，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最早的範例之一。它在世界的革命人民中也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特別是為許多世紀以來遭受著同中國類似的苦難，進行著類似的鬥爭的亞、非、拉的廣大人民，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與教訓。